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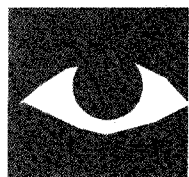


道德教育与公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德育情境教学模拟实验
德育在大学生情商培育中的作用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的内涵

Daxuesheng Deyu Yu Jiazhiguan Jiaoyu Yanjiu

大学生德育与价值观教育研究

徐海波/主 编 王晓丽/副主编



大学生德育与价值观教育研究

Daxuesheng Deyu Yu Jiazhiguan Jiaoyu Yanjiu

徐海波/主 编 王晓丽/副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生德育与价值观教育研究 / 徐海波主编.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11

ISBN 978-7-210-05722-2

I.①大… II.①徐… III.①大学生-德育-文集

②大学生-价值(哲学)-文集 IV.①G64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64032 号

大学生德育与价值观教育研究

作 者:徐海波

责任编辑:徐明德 徐旻

封面设计:同异文化传媒

出 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 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0791-86898965

发行部电话:0791-86898801

邮 编:330006

网 址:www.jxpsh.com

E-mail:gjzx999@126.com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18.5

字 数:300 千

ISBN 978-7-210-05722-2

赣版权登字—01—2012—532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 价:36.00 元

承 印 厂:江西茂源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内地大学道德教育与公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徐海波 1
德育情境教学模拟实验:内涵、理论基础及其 建构	包毅 13
新课程方案实施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 制约性因素分析	王双印 22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因材施教”研究	郑湘萍 32
浅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以人为本”的内涵	王志忠 39
高校基层党组织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思考和 探索	梁杰 46
高校基层党组织学生党组织生活现状调查报告	周小茜 廖江海 53
我国“9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 与对策	主金华 60
高校德育在大学生情商培育中的作用	樊芳 69
思想政治教育应对“经济人”问题研究	李潇潇 77
发散中求真:特区高校思政课创新教学方法浅议	和杰 90
中西德育概念的比较	李勇 96
中美高校德育课程设置的比较与启示	邵婧瑜 106
深圳大学新疆少数民族学生特点与矛盾及其 德育对策	李楠 115

大学生立体价值观研究	林济霖	124
价值澄清理论及其对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教育 的启示	张革华 原艺瑞	137
高校共青团对大学生就业的思想引导	黎科	145
文化视阈下廉洁建设进路	李柏颐	153
融“真善美”于论文写作之中	叶珊	162
从辅导员的视角谈构建幸福校园	何娇 陈德辉	168
为应届毕业大学生开设“母亲教育”课程的 重要性	彭催迎	175
和与中——浅析孔子中庸思想与亚里士多德 中道思想	涂剑霞 董世峰	184
高校大学生信教问题透析	彭娟	192
论“大众文化”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价值和作用	徐博决	200
虚拟社会对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郑志平	208
贫困大学生社团参与和心理健康关系研究： 以深圳大学为例	唐咏	220
论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育人功能的 完善	姜卓男	230
建筑设计风格演变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	谷鑫	238
大学生对班级心理信息员的认知状况调查		246
高校学生工作队伍专业化发展探析	杜妩	261
浅析我国会计职业道德建设	潘元元	270
《共产党宣言》与全球化	王晓丽 桑莎	276
经济体制改革框架下的分配制度改革	王晓丽 桑莎	285

内地大学道德教育与公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徐海波

摘要:21世纪是一个中国社会转型和全球化趋势不断拓展和深化的世纪。全球化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同时也是政治、文化的全球化。众所周知,全球化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西化、现代化。全球化加强了全球的认同意识,同时还加深了根源性。全球化意味着多样性、多元化,它代表着宽容和尊重。正因为此,中国社会转型和全球化不仅对中国大学中道德教育与公民教育提出了严峻挑战,同时也为中国大学中道德教育与公民教育^①赢得了新的发展机遇。

关键词:意识形态;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内地

我们知道,中国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当落后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正是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产生和建设的特殊性,为了准确把握中国社会历史现阶段,我认为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认识中国社会。这个角度就是把中国放

* 本文系 2011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香港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研究”(11YJA710061)阶段性成果;2012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香港群体意识形态与内地主流意识形态相互作用的机制和途径研究”(12BSH036)成果之一。

①道德教育(moral education)是指形成人们一定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规范的教育,是学校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为了提道德认识、陶冶道德情感、锻炼道德意志、确立道德信念以及培养道德行为习惯等。而公民教育(citizenship education)原本是德国教育家凯兴斯泰纳提出的一种教育理论,主张教育要以培养“良好公民”为目标,而“良好公民”则必须为国家利益服务。现在一般指国家或社会根据有关的法律和要求,培养其所属成员具有忠诚地履行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品格与能力等的教育。我国于五四运动前后兴起此项教育制度。

入世界工业化和现代化大趋势中,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把握中国现状。从世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来把握中国发展的现状,中国无疑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社会转型,正在向现代化和工业化目标迈进。如果今天,这一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时刻,没有一个对中国现状和社会现实正确和全面的认识,没有一个对中国社会现状的深刻分析,将无法找到中国今后发展的方向和途径。由此看来,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中,我们不得不重新对中国的现状进行一次分析和认识,这种全面、正确和深刻的认识将成为我们的实践基础和出发点。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市场机制代替了计划机制,市场机制的核心是市场规则,它表现为一系列的相互配套的法律、规则和制度。也就是说,法律成为市场经济运转的关键。政府在经济活动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小,在经济活动中的干预范围也越来越小。政府再也不能依靠其所垄断的资源来控制社会,控制社会经济的运行方向和运行方式,而要依靠在市场经济中所建立的法律法规来约束和控制经济的运转和变化,从而达到控制社会运行的目标。因此,中国社会的转型,从经济体制改革意义上说,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从社会控制的意义上说,它是政府控制职能和功能的分化过程,控制方式由以政权为核心的行政控制转变为以法律为核心的控制过程。法律控制功能的增强和行政控制功能的减弱是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的另一巨大变化,这样一种变化也深深地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

这些发生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中的变化也改变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价值标准、道德标准。如果说,社会组织形式和制度具有强制性和规范性的功能,那么在社会中还有一些非强制性和非规范性的控制手段,例如社会舆论、社会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社会评价等。随着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组织体系和制度体系的变化,人们的思想意识领域也不可能不跟随着发生相应的变化。社会转型是一个充满矛盾与冲突的过程,表现在价值判断体系的转型上就出现了旧的传统价值判断不断地受到新的价值判断的评价和挑战,不符合社会转型潮流的那部分价值观和价值判断标准逐步被新产生的价值评判标准所代替,旧的价值评判体系在社会转型中不断瓦解,它的社会控制功能在不断地削弱。同时,

新的价值评判体系在不断建立和完善。因此我们可以说,价值评判体系的转型既是社会转型的反映,又同时表现为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30多年来,旧的价值判断体系和价值观已经再也不能在社会行为中起主导作用,新的价值评判体系和道德观在迅速建立,并扩展其影响力。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团体利益与社会个体利益之间的矛盾构成了价值评判的一个新热点。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正确地把握中国的社会转型也就是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这是我们制定一切政策、方针和路线的基础与出发点。在改革开放初期,正是由于邓小平同志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解放运动,彻底解除了人们头脑中的僵化和固定的认识模式,使我们重新对中国社会现状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有了对中国国情的正确认识,这就找到了我们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和目标,也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因此,在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我们同样面临着对中国国情的一次再认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确认识和把握这种变化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基础和出发点。没有这样一个对中国现状清醒的再认识,我们将会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迷失方向。

如何对中国进行再认识,我觉得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参考系数,一个是要将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背景下进行再认识,另一个是要将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放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再认识。在这两个参照系数的对比下,我们就可以完整和全面地认识中国社会转型期中的一些带有本质性的特征,这些认识将成为我们继续进行改革开放的基础和出发点。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极为重要的构成部分,为我们认识中国国情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指出,中国社会的发展由中国社会的客观物质条件所决定,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在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贫穷和落后的基础上开始这项人类伟大的事业。这样一种客观物质基础就决定了我们建设的是一个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发展的这个初级阶段中,我们首先要确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这一点是由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所决定的。但中国的社会主义又是一个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它是由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还相对落后这一客观条件所决定的。因此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我们在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同时,还要结

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和水平,允许各种形式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存在,也就是说,要建立起一种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客观需要。由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这种状况,在劳动产品的分配过程中我们就必然要采取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劳动产品分配方式,我们就必须大力发展公有制下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我们就必须提倡一部分人在公正合法的经营活动中首先富起来,然后通过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目标。这就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全面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路线都是在这个认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30多年的经济改革也证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正确性,证明了这是对中国社会客观状况的一个完整和全面的认识。在社会转型期中,如何把握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如何把握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变化,如何认识和评价这些变化,我认为,都应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过程相结合。因此,中国社会的转型也就是发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过程中的社会转型,也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过程中,中国社会从传统的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的过程。如果我们不这样看问题,我们就很可能会把中国社会转型的方向和目标遗忘,使我们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产生失误。

二

我们在把握和认识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时,应把转型过程与“经济全球化”联系起来加以认识和分析。我们现在正处在新世纪之初,整个世界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随着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生产社会化的规模已经从国界内向全球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经济全球化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转型。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在资本国际化的过程中,世界经济正在走向一体化,在这种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过程中,很多传统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都面临着冲击和挑战。中国社会的转型和经济一体化过程同时发生,因此我们就不可能不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过程中来完成中国社会的转型,中国社会的转型也因此不可能不受到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深刻影响。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工业之间的矛盾、跨国公司和传统民族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

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与旧经济制度之间的矛盾都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不仅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挑战,也是对世界一切传统的挑战。但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应该抓住的一个极好的机遇。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彻底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也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在时间和空间上把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展现在每个人的面前。因此在面临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挑战时,我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完成的制度转型和思想文化转型应该适应全球化和一体化需要。要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过程中完成中国社会的转型,完成中国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以及思想文化的转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中国的社会制度应该更加有利于中国社会融入世界经济的大潮中,中国的政治制度应该具有更大弹性和张力,中国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道德观应该具有更大的生命力。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社会的转型不但要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还应该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过程转变。只有这样去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我们才能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

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化,这种变化现在刚刚开始,它将以不可阻挡的力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渗透到每一个人的生活。这股不可阻挡的力量将粉碎它面前的一切障碍和阻力,推动社会变化。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是一个从半农业、半工业的社会跨入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如果把中国社会转型期放在这个历史角度中加以理解,我们就可以清楚地把握在转型期中出现的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也可以借鉴历史上很多国家在完成这种转型中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经验,使我们在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过渡中,少走弯路和少受挫折。

在中国社会转型的问题上,我们还应该分清,这是社会结构的转型,还是社会制度的转型。区分这两种转型有着相当重大的意义。在对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的认识上还存在另外一种错误认识,认为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是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转型,中国正在发生从一种社会形态向另外一种社会形态的过渡。中国社会现在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种变化绝对不是生产方式的变革,绝对不是社会形态的变革,绝对不是中国社会制度的变革。中国社会中所发生的改革和开放是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在中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

段,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表现为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矛盾,而仅仅是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和环节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因此,才有改革的需要。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对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方面和环节作了很大调整,使它重新适应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进而推动了生产力进步和发展。在这个改革过程中,我们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也相应作了一系列调整和改革,但绝非表现为整个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质变。因此我认为,中国社会的转型应该理解为中国社会结构的调整 and 变化,这个结构既包括了社会经济结构,也包括了社会的上层建筑结构,既包括了社会的阶级结构,也包括了社会的意识形态结构。但这种结构调整是在现有生产方式内的调整,只有这样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结构变化,才是一种正确的认识。

中国社会转型期中必然产生利益分化,这种现象表现得越来越清楚。社会转型造成利益的分化,必然深刻影响人们的社会意识,这种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利益分化也必然影响社会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和客观评价这一现象,探讨它对社会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影响,以及重新认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意识形态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中国社会转型期,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过程,市场正越来越在社会资源的配置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转型社会中的利益格局的变迁,也同时是社会资源尤其是经济资源的配置模式的转变。在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中,资源的配置方式和配置结果导致了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中的利益格局分化。由于社会各个成员在经济体制转化过程中的地位不同,社会角色不同,能力的不同,就导致了他们在收入及获得的财富上出现较大的差距。过去处在同一经济状态和社会地位的人,随着社会转型和利益格局的分化,他们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成员的收入和财产差距正在不断地扩大,社会的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社会一部分成员通过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成为富裕阶层,而大部分人处于社会收入的低层,成为相对贫困的一个阶层。在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开始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利益格局正在进行一次新重组。

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经济利益的分化和新的经济利益格局的形成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这种现象引发了很多社会问题。因此,我认为,在

研究社会转型期中的意识形态冲突时应该联系这些现象,联系社会利益分化对人们思想意识的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理解和认识社会意识形态冲突产生的根源和具体的表现形态。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全面的社会转型,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改革措施和法律的滞后,伴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也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分化。社会分化产生的原因非常复杂,有些原因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我国经济相对落后造成的,这些矛盾会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得到解决,或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而逐步缓解;有些原因是因为改革开放的制度和措施不完善、法律不健全而造成的,这些也会随着条件的改善而改善。马克思曾经深刻指出,经济利益的矛盾和冲突是一切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源。因此,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中出现的利益格局的调整和经济利益的分化,必然导致社会阶层分化,也必然导致社会矛盾和冲突,而这些矛盾最终一定会被反映和表现在社会意识形态中。

三

经济利益的分化引起社会的重新分化,必然也引起政治、文化上的分化和冲突,我们可以在中国现阶段发展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随着经济利益的调整 and 分化,人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也开始发生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反映了经济利益的变化,反映了经济利益格局的变化。因此,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中,各种思想流派、学说观点纷纷浮现了出来,最终表现为社会转型期中的意识形态冲突。回顾 30 多年走过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经济利益格局的变化,意识形态内的斗争和冲突也非常激烈。总的来说,这是正常的现象。马克思曾经很明确地指出过,经济基础中的任何变化,最终都会被反映到思想意识中,都会被反映在社会意识形态中。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看,随着社会转型期中的社会分化产生,在我国思想领域引发了一些什么问题。

在 21 世纪的这最初几年的时间里,我们就已经感受到,全球化和变革的速度越来越快,由此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引起了“混乱”、“困惑”、“迷茫”和“怀疑”等(我们可以用很多描述“不确定”状态的词来描述这种精神状态)。

美国学者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对此曾作出这样的描述:“当前人类

的道德实践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这一危机体现在三个方面:(1)社会生活中道德判断的运用,是纯主观的和情感性的;(2)个人的道德立场、道德原则和道德价值的选择,是一种没有客观依据的主观选择;(3)从传统的意义上,德性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并从以往的社会生活中所占据的中心位置退居到生活的边缘。因此,在当代的道德变化中,便没有绝对的合理权威,从而导致道德危机。而中国学者檀传宝先生在其著作《信仰教育与道德教育》一书中也指出:“在今天,旧的信仰体系(极‘左’的政治狂热)已经消散;新的信仰体系(理性和‘科学’的终极价值目标)在许多人身上又尚未建立。这种真空状态造成了一系列社会和教育上的病态。”这种信仰的“真空状态”,实质上就是指信仰危机,就是指人们信仰中的矛盾、冲突和混沌的状态。这些就是在 21 世纪初,我们在学校开展道德教育与公民教育时面临的现状。因此,如何采取有效措施,面对这一挑战,就成为关键所在。

深圳毗邻港澳,处在两种制度、文化和观念的交会点上。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场”,率先实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较早在全国进行了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试验。作为新生事物吸收最快的社会群体之一,青年大学生反映着市场经济的变化。在特区的大学生中,学习兴趣、生活爱好广泛,求知、求实、求真的要求迫切,竞争意识、风险意识、自主意识浓厚,成才意识、创新意识、民主意识强烈;价值观中更注重个人的发展,就业观中更看重收入待遇、施展才能的机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的扩大和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消极因素和西方腐朽思想观念对高校学生的影响也日显突出。市场经济是双刃剑,自由竞争和等价交换的原则有利于大学生确立平等、竞争、效率和创新意识。但也易于使等价交换和利益驱动原则泛化到其他领域。因此,如何既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对大学生思想意识的侵蚀,就成为经济特区大学“公民道德”教育需要解决的课题。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深圳大学无论在地域空间、信息交流,还是在思想上与外界交流都更加密切。大学生随时上网接触世界文化思潮,与越来越多境外人士交往交流,自觉不自觉地接触感受到各种文化思潮和价值观。随着中国向西方打开国门,各种思潮传入我国,影响波及我国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学生不仅从书本和课堂上接受教育,通过互联网,他们还感受来自社会和国际的影响。当今

世界正发生重大的变化,经济全球化趋势持续发展,科技进步一日千里,知识创新大大加快,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这一切,形成了一个与过去所处的迥然不同的环境。传统与现代的相遇,新与旧的冲突,先进与落后的对垒,中、西文化的碰撞,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这一切都引起当代大学生的生活方式、社会心理、思想观念的急剧变化。

下面我就围绕“德育”这个主题,谈谈大学的道德教育与公民教育。我认为,在中国,大学的道德教育与公民教育主要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理想与信念教育、价值观教育和道德观教育。在中国,大学的培养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中国公民”。为了完成这个目标,我认为,我们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如何利用全球化这一有利趋势,在批判吸收他国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整合我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构建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理论应该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总体上解释中国的现状,指出中国社会发展的未来路径,应该是能成为学生理想和信念的理论。

其次,准确定位学校道德教育与公民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角色和功能。我认为,学校道德教育是教育的基础和核心。学校道德教育与公民教育不是单纯的知识传授,对于道德教育与公民教育来说,情感、体验和实践更为重要。因此,学校在进行道德教育与公民教育的过程中,一定要把道德教育与公民教育融入现实生活的每一个环节,实现道德教育生活化。在进行道德教育的过程中,教育方式应该是多元的,一定要采取理性与感性、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唯有如此,方能取得效果。

高等院校担负着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任务,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的改革开放能否深入下去,党的基本路线能否一百年不动摇,关键在于当今我们培养的大学生的素质。尽管深圳大学地处经济特区,与全国其他大学面临的社会经济与人文环境有所不同,但是自建校以来,在办学理念上,深圳大学始终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在思想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始终保证和党中央高度一致。在对广大青年学生进行正确的世界观、道德观、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方面,深圳大学的“公民道德”教育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公民道德”教

育教学还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与飞速发展的时代要求和迅速变化的社会实践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公民道德”教学改革迫在眉睫。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深圳大学对“公民道德”课程的设置、讲授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都作了适当的调整和改革。

教学改革的先导是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的转变。为使“公民道德”教育教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必须改变制约和影响“公民道德”教学的旧思想和旧观念。把过去“公民道德”教育单一的政治功能,转变到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培养健康、高尚人格上来;从过去认为“公民道德”教育单纯是灌输意识形态的观念,转变到“教学为育人”的观念上来;从“公民道德”教育单一的教学为本的观念,转变到教研共进的观念上来。

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教育课固然是对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但它同时又具有培育学生人文修养、丰富人文精神的作用。“公民道德”内容本身就是以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为基础,同时也渗透着许多其他社会科学知识。不懂得德国古典哲学就很难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懂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和几千年中华文明史,就难以真正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如果剔除其丰富的人文内涵,“公民道德”教育将难以实现其目标和价值。

我们处在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迅速、知识经济特征愈来愈显著的时代,提高人的基础素质显得格外重要。教育既要给学生以知识和能力,又需要提高人才的整体素质,处理好基础性与前沿性、专业性与综合性的关系,体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和谐统一。人文素质教育是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才质量的基础因素。这要求我们的“公民道德”教育在培养人的过程中注重他们的基本的内在素质,特别是他们的人文素质,从而适应时代的要求。

在以往“公民道德”教学模式中,最大的弊端就是割裂理论教学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教学的根本任务之一,是向学生传授人类数千年来积累下的科学知识。对学生来说,这些知识基本上都是间接经验,是前人对自己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的认识与概括。不吸收间接知识,就无法在人类认识的基础上继续开拓新的认识领域。但是,间接知识并不是唯一的知识,必须重视教学中的实践性环节,使学生立足校内,面向社会,丰富学生的认识,扩大学生的视野,让理论教学和

实践教学各展其长、相辅相成,提高“公民道德”教学的体验性和实效性。

面对“公民道德”教育改革不断深化和素质教育全面推进,面对跨世纪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单一的课堂理论教学已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要想让“公民道德”教学真正做到“入脑、入耳、入心”,“公民道德”教学必须适度地走出校园,走向企业和农村,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的主战场,让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去思考和领悟理论的真谛。

开展实践教学的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一些实践教学基地。深圳大学根据教学实际,首先明确了建立实践教学基地的原则:第一,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教学基地要紧密配合课堂理论教学,是理论教学内容的延伸。第二,突出深圳的地方特色。深圳的历史源远流长,又是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和最大的移民城市,实践教学基地要着重体现深圳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人文精神等。第三,由于“公民道德”课程学生人数众多,因此实践教学基地的接待能力要大,容纳能力要强,参观费用要低廉或者减免。

遵照上述原则,学校在深圳市内选择“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龙岗区南岭村、宝安区万丰村,并选择石化集团、赛格集团、金地集团、华侨城等四个效益较好的不同类型企业,建立起经常性的教学、实习、调研基地,开通了多方面的教育学习渠道。

近几年,深圳大学按计划分期分批地开展实践教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到目前为止,学校已分批组织学生多次赴各基地进行参观调查,听取各单位有关负责人的专题介绍。其中,石化集团、赛格集团抓大放小、组建大型企业集团,金地集团内部员工持股改革,华侨城的企业文化建设,龙岗区南岭村的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宝安区万丰村的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邓小平理论在深圳实践中结出的硕果,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就实践内容组织学生写心得体会、社会调查报告。通过这些活动,有利于学生更深入地思考问题,有利于学生写作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更深入地了解社会现实。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涌现出许多新事物和新问题,有些问题在书中找不到答案,因此必须引导学生到现实中去,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研究,把社会实践作为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开展社会调查是改变理论与实践

脱节现状的重要方法和途径。在具体操作中,深圳大学将实践教学纳入“公民道德”教学整体过程,明确每门课程的实践教学内容、目的、方式、任务、学时和实践教学考核办法,从而使实践教学取得实效。

深圳大学的教学是通过以下方式完成上面的教学目的(仅以一事为例)。在思想品德课的教学过程中安排课堂讨论和教学实践环节。在课堂讨论和实践中,把学生分成10人一组,以组为单位给成绩。例如一个讨论题分发下去后,全组人员分工合作,有些人上网查资料,有些人去图书馆查资料,有人负责执笔,口才好的负责最后讨论时发言。学生们在活动中深刻地认识到团队的重要,分工和协作的重要;认识到集体主义价值观、道德观的合理性。此外,要求学生在工作的同时参加学校的义工联活动。以上教育都是为了让学生在价值观上明白“系统大于要素”,国家、社会和家庭大于个人,个人是一个对国家、社会和家庭负有责任的主体,使学生对“集体主义”价值观产生认同。在道德观上使学生明白,道德是直指个人的良心世界,是以人性为基础,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道德教育和价值教育就是让学生对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当它们之间发生矛盾时作出正确的选择。

参考文献:

- [1][美]麦金泰尔.德性之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 [2]檀传宝.信仰教育与道德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徐海波(1956—),男,安徽嘉山人,深圳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唯物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文化社会学研究。